

行走河南 探访新郑

露天博物馆,俯仰皆是文化渊源



具茨山下,溱洧河畔。黄帝故里,郑韩故城。在人类文明初露曙光之际,中原大地的先民们就开始用他们双手和智慧书写起辉煌灿烂的河南历史。

行走河南,集零光片羽织就中原文化之锦缎。5月16日,由郑州报业集团旗下正观新闻·郑州晚报主办,一汽-大众、星联城、邮储银行郑州市分行、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特别支持的2023“行走河南”黄河文化探访之旅采访团队,从位于郑州CCD常西湖的星联城出发,来到此行第一站——新郑,走进郑国车马坑遗址、裴李岗遗址和欧阳修陵园纪念馆,重新梳理新郑作为“寻根之地”的文化渊源。

战略合作: 一汽-大众 特别支持: 星联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郑州市分行 浦发银行 郑州分行 浦发银行 郑州分行

在郑国车马坑 见证东周的时代变革

新郑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新郑这个名字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诗经·郑风》有诗曰:“溱与洧,方涣涣兮。溱与洧,浏其清矣。”早在公元前769年,郑桓公迁都于溱洧之水交汇处,定名新郑,自此这座城市的名字就再未变过。

郑庄公以其雄才伟略,带领郑国迅速崛起,开启了群雄争霸的变革时代。从春秋时期的郑国到战国时期的韩国,新郑有500多年的国都史,被后人称为“郑韩故城”。

这段消逝在时光中的恢弘历史,让新郑在史书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露天博物馆”的美称。而郑国车马坑遗址,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让人震撼的遗存之一。

“郑韩故城平面呈牛角状,俗称‘四十五里牛角城’。车马坑遗址在后端湾一带,三面环水,是一个难得的风水宝地,因此有20多位国君葬在此处。”据郑国车马坑博物馆马娇介绍,该区域有春秋墓3000余座,大中型车

马坑23座,其中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座,长宽均超过20米的特大型墓4座。其贵族墓与车马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东周文化的奇迹。

据马娇介绍,春秋时期,战事频繁,车辆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商品”,车马的数量也是衡量诸侯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

由于保护困难,郑国车马坑已挖掘的部分只占据了整片墓葬区的冰山一角。郑国车马坑博物馆原馆长李宏昌感慨:“郑国车马坑的规模很大,它构成了我国截至目前春秋时期葬车最多、规模最大的地下车马军阵,比闻名中外的秦陵兵马俑军阵还要早400多年。”他颇为遗憾地表示,最初发掘时车马上留有红色的颜料,表现出郑国“尚红”的社会风尚,但出土后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经历2000余年的岁月侵蚀,由木头制成的葬车已与泥土凝固在一起,形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木和土的结晶体。唯有在一辆仪仗车下发现的象牙车踵,仍保留着曾经的模样,向世人诉说着2700多年前的新郑往事。



郑国车马坑遗址向世人诉说着2700多年前的新郑往事

在欧阳修陵园 感念醉翁的文脉传承

俗话说,人杰地灵。新郑作为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里、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诞生了黄帝、子产、韩非、张良、白居易、高拱等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名人。但有这样一个人,他生前与新郑的交集不多,死后却在这里留下了可称为“传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就是自号“醉翁”的一代文宗欧阳修。

新郑市城西13公里处的欧阳寺村,是欧阳修的长眠之地。公元1075年,欧阳修被宋神宗赐葬此地,其后他的第三夫人薛氏和他的4个儿子、2个孙子陆续葬入,逐渐形成了欧阳修的家族墓群。又因欧阳修墓前建有敕建寺院,该村就以“欧阳寺”为名。

欧阳修陵园纪念馆讲解员刘彪向探访团队介绍,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州永丰)、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长于随州(今湖北随县)的欧阳修,之所以会葬在新郑,主要与宋代的一项丧葬制度有关。他表示:“三品以上的大臣要赐葬在京畿500里以内,而且北宋的皇陵在今天的河南巩义,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就以

能够陪葬在皇陵左右为一种无上的荣耀。”

欧阳修曾有言“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一代文宗欧阳修,不仅在当时有崇高的威望,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而且对后世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学术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所创作的《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作品,寄寓了宽简有度的政治理想和寄情山水的人生感望,一直是广为传诵的佳作。

1994年,新郑市重新修葺了欧阳修陵园纪念馆。大殿塑有欧阳修坐像,以供祭祀;大殿内矗立有明代的“宋太师欧阳文忠公之墓”石碑;东配殿则是苏轼手书的欧阳修著名代表作《醉翁亭记》碑刻展;祭殿后便是欧阳修墓,并排右侧是其继配夫人薛氏墓。

馆内还移植了许多青松古柏与翠竹花草,树影婆娑、光影斑驳,那个写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人,终于能够再次安眠于山水之间。

在裴李岗遗址 寻找“人类逝去童年”



李永强介绍裴李岗遗址的最新研究发现

浩渺清澄的溱洧两河,汇流而成双洎河,在这片水域东北侧河湾的一片岗地上,有一个名为裴李岗的村庄。然而,就是这片岗地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将人类文明的曙光推进到了8000年前,也让“裴李岗”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名字响彻了大江南北。

提起裴李岗遗址,不少人都能围绕其发掘意义说上几句。诸如“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证明了早在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开始在中原定居”“展现了我国农耕文化的起源”云云,都是中肯的评价,也在事实上确定了它的考古学地位。

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裴李岗遗址现场发掘负责人李永强看来,裴李岗遗址对公众的价值,不在于这些宏大的、被高度概括

了的意义,而在于那些具体而微的事物——古裴李岗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他们和现代人有什么联系?

“这里出土的壶、碗、锅、铲,以及用来过滤的器物,和我们现代人使用的区别并不大,起码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可以说,远古古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让我们至今受益。”站在考古发掘现场,李永强介绍起裴李岗遗址的最新研究发现。

有趣的是,研究队曾在两件陪葬陶壶中检测出了丰富的红曲霉菌和闭囊壳,以及具有发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他们据此推测,陶壶是用于酿酒和贮酒的,甚至古裴李岗人种植粮食的初衷,很可能就是出于对酒的需求。

李永强还谈到,从前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一直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但自2018年遗址发掘重新启动以来,考古出土了26000年前的鸵鸟蛋串珠、细石器和牙齿,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裴李岗地区已有人类在此生产、生活。

李永强将自己多年以来奔波于田野的考古工作,视为对“人类逝去童年”的寻找。在他的讲述中,先民向中原地区开拓进取的关键步伐被一一还原,这块孕育了古老生命与文明的土地也熠熠生辉。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晓璐/文 徐宗福/图

采访团队:舒晗 樊无敌 陈君平 张俊 杨雅晴 郑治红